

17.12



繼承先烈志

振興湘鄂邊

為湘鄂邊蘇區革命烈士紀念碑題

廖漢生

元年十二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题词



## 目 录

略论鹤峰苏区在湘鄂西武装割据中的 战略地位及其特点	中共鹤峰县委员会	1
湘鄂西红四军的十一次整编	张德	16
试论贺龙同志在创建鹤峰苏区中的 统战思想	祝锋尚成	24
中共湘鄂边特委	鹤峰县史志办公室	31
红二军独立团始末记	伍伯显	41
山上开满红杜鹃——鹤峰苏区行	龚光美	58
走马一路到鹤峰 ——献给苏区人民的歌	张迈	64
附录：鹤峰苏区区以上党政军群 组织系列		67
后记	编者	91

# 略论鹤峰苏区在湘鄂西武装割据中的战略地位及其特点

中共鹤峰县委员会

鹤峰，地处鄂西南武陵山脉东段，是一个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同汉族聚居的山区小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武装割据中，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湘鄂边红四军的摇篮，又是湘鄂西武装割据的战略后方。在这里，贺龙等同志创建了湘鄂西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最广泛地动员起来，同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成长，为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理论，作出实践，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为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鹤峰苏区是湘鄂西武装割据的战略后方

为了开创湘鄂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贺锦斋、李良耀、芦冬生等二十余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来到湘西桑植县洪家关，建立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桑植县城。工农革命军初战告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立即纠集军队进攻工农革命军，4月初，工农革命军立足未

稳，在贵州军阀 4 3 军龙毓仁旅的攻击下，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相继失守，革命军被打散，余部撤到鹤峰境内堰坪山区的红土坪，贺龙化名“车胡子”在桑（植）鹤（峰）边界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并派人到鹤峰县城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鹤峰党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并抓紧争取“神兵”的工作，为实现湘鄂西的武装割据作准备，还派李良耀协助工作。四月下旬，在桑植被打散的王香权、刘玉阶、李少白等部也到了红土坪，经过休整扩军，部队发展到 700 多人。1928 年 6 月，工农革命军再次出击洪家关，因敌强我弱，战斗失利，只剩 300 余人，第二次退到鹤峰七郎坪。1928 年 7 月初，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委成立，部队进行初步整顿，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部队根据几次挫折的教训，决定：一、以我军无产阶级革命化思想为指导改造旧部队，加紧对下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军事训练，吸收士兵进步分子入党；二、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三、确立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准备东进石门，扩大游击战争。这次整军发展士兵党员 40 人，大队以上设党代表。部队扩大到 1500 人。8 月 20 日，工农革命军从七郎坪和罗峪出发东进石门，支援石门南乡暴动，计划向松滋、澧县发展，于 9 月 8 日回师渫阳，遭敌军袭击，黄鳌牺牲。10 月 21 日石门丝毛岭战斗失利，贺锦斋牺牲，工农革命军第三次退到鹤峰梅坪、堰坪，当时部队仅存百余人。1928 年 11 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鹤峰堰坪整军。此时中共湘西前委更名为湘鄂西前委，贺龙为书记，在最困难的时刻，驻鹤峰太平锅耳台的贺民英游击队给工农革命军送来一批布匹和棉花，

同时找了十几个裁缝为工农革命军官兵日夜赶做棉衣，并协助整顿，疏散和安置伤病员和家属。经过整顿的工农革命军基本队伍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人数减少了，但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有所加强。

1928年冬，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姜文周团分两路由湖南白竹坪、三合街向红土坪进攻，我军血战突围，伤亡甚重。前委决定革命军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贺龙、陈协平等四十余人转战于红土坪、七郎坪、堰垭、桑木坪、红鱼坪一带大山中，与敌周旋于山林峡谷，几乎天天搬家，夜夜转移。工农革命军得到了山里群众的支持，特别是贫苦农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工农革命军，筹集粮食，侦察敌情，联络亲友，发动群众。敌军“进剿”月余，一无所获，只好在红土坪放火烧掉贺龙和红军住过的一所房子，然后悻悻而去。姜文周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写道：“该逆防范周密，日久数迁，据险固守，诚不易攻。”①

工农革命军在堰垭地区的艰苦游击战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湘鄂边游击战争的客观规律，以适应湘鄂边武装割据初期的客观形势。前委鉴于湖南方面敌人力量较强，决定改变策略，选择敌人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进攻以开辟游击区域。1928年12月14日，工农革命军自鹤峰梅坪出发，经湖北宣恩、咸丰、利川、恩施迂回游击，攻克建始县城，然后抵达地处鹤峰北部的邬阳关。1928年底，贺龙在邬阳关斑竹园会见了“神兵”首领陈连振，启发他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反动统治阶级，参加创建苏维埃的斗争。早已受我党影响的陈连振欣然接受收编，1929年元月3日，二百多“神兵”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

长，覃苏任副大队长。元月7日，工农革命军四百多人两百多条枪，从邬阳关出发，在观音坡击溃鹤峰县常练队，接着以特科大队为前锋，②8日，强攻威风台，接着“克鹤峰城、太平镇、洞长湾，开始以鹤峰为中心创建根据地”③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向中央汇报说，“腊月初三日，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委员为吴天锡、江景云、徐锡如、汪毅夫、陈宗瑜、范松之、吴秉奎等。当天开庆祝大会，宣布了苏维埃政纲，参加会的贫苦民众约六百多人，革命空气异常高涨。”④2月，建立中共鹤峰县委，接受湘鄂西前委领导，“有陈协平、刘植吾、徐锡如等负责，各支部工作亦在积极进行。”⑤

1929年2月初，工农革命军集结于鹤峰梅坪杜家村，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学习关于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职）。贺龙回忆说：“进鹤峰后，整理了部队，搞起了苏维埃，红军中有了党代表，政治部……”⑥这才站稳了脚跟。

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主力在鹤峰七进七出，每次失利受挫，都返回鹤峰休整，扩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之后，又开始新的出击。在湘鄂西割据时期，红二军团历史上（包括工农革命军、红四军及后来的红二军团、红三军）十一次有史可考的整编，有六次是在鹤峰境内进行的。⑦这样，在湘鄂西割据的全部过程中，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始终作为巩固的战略后方而存在。地方党和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土地革命的进行，统一战线的建立，扩大了武装割据的政治影响，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为湘鄂西大规模武装割据奠定了巩固发展的基础。

## 鹤峰苏区是湘鄂边苏区的中心 和四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就首先要求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相当规模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发展作为重要保证，更需要有一块十分巩固的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中共鹤峰县委的成立，揭开了湘鄂西武装割据斗争的序幕。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信指出：“从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经过看来，你们发动了群众，镇压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枪支，这些都是合乎游击战争的原则的。”⑦

面对湘鄂西武装斗争规模的扩大，敌人感到了严重威胁，1929年3月发动了对红四军的“围剿。”红四军依靠巩固的群众基础，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开展反“围剿”，3月18日的红鱼溪大捷，一举歼灭湘鄂西民团主力，并将敌总指挥王文轩击毙，左翼孙俊峰亦闻风而逃。从而彻底粉碎各路团防分进合击的部署，使鹤峰红色政权出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局面，红四军发展到3000多人。1929年6月14日红四军再攻桑植县城，建立了桑植县苏维埃政府，湘鄂边苏区迅速扩大。桑植境内南岔、赤溪两次战斗后，红四军发展到5000多人。同年10月，红四军与国民党“围剿”军作

战，因五团长伍琴甫叛变，战斗失利，一团团长贺贵如、四团团长陈宗瑜牺牲，红四军撤到鹤峰西北的红岩坪休整。11月又在邬阳关组建红四军第五路军指挥部，指挥陈连振，党代表刘植吾，下辖四个团，共1500余人。1930年初，红四军受命东下与红六军会师，配合一、三军团攻打中心城市，第一次从邬阳关出发东进，在五峰渔洋关受敌阻截，“损失千多人，撤回鹤峰整顿。”⑧3月，红四军从鹤峰五里坪出发二次东进。在五鹤边境消灭大团防孙俊峰，在湾潭鹿儿庄成立了五峰县苏维埃政府。⑨

红四军东下之前，为加强苏区政治军事的统一领导，成立了鹤峰中心县委。“鹤峰有中心县委，总管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⑩其后长阳、石门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这时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中心，把长阳、五峰、桑植、石门等县部分地区联成了一片，形势一派大好。”⑪1930年12月，红二军团克津市、围澧州，后在杨林市被强敌围困，且战且走，退回鹤峰，接着就在中心县委、鹤峰独立团和贺民英游击队配合下，在走马坪收编了川军甘占元等部3000余人，得到很大补充。1931年初，红二军团向石门出击，在瓜子峪失利后再退鹤峰走马坪，休整后再出鹤峰，连克五峰、长阳、资丘，到枝柘坪改编为红三军。红二军团前委在枝柘坪开会决定，成立湘鄂边分特委和联县政府，组建教导师留守湘鄂边，以鹤峰为依托，巩固湘鄂边苏区。4月3日决定分特委机关和联县政府设鹤峰五里坪，4月7日正式办公。5月初，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代表唐赤英到五里坪主持分特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分特委为特委，周小康任书记。特委和联县政府在军事上除领导和指挥独立团

以外，还发展和整顿苏区地方武装。各县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尽管此后一年多时间内红三军远离湘鄂边，独立团仍在人民支援下与十倍于我之敌开展游击，有效地保卫了苏区的土地革命，直到1932年下半年向江陵转移。

1932年7月和9月，监利周老咀、洪湖瞿家湾先后失守。红三军退出洪湖，经豫南、陕南、川东入鄂西巴东，然后南渡长江，于1932年12月到达邬阳关。12月30日攻占鹤峰县城，恢复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在走马坪开会，再次作出了“以鹤峰为中心发展周围苏区的决定。”②由于湘鄂边武装割据历时五年，鹤峰早被敌人视为贺龙和红军的“老巢”，他们估计到红三军离开洪湖，必回鹤峰，因而倾力进攻湘鄂边成为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果然，红三军刚到鹤峰，敌军就蜂拥而至，迫使红三军在七千里长途转战之后又仓卒投入战斗。红三军在走马坪和芦冬生率领的独立师会合后，整编为七、九两师，红三军军部、中央分局机关随之迁往邬阳关、金果坪、红岩坪等地，一边反“围剿”，一边打给养，一边搞“肃反”。1933年12月，敌军占领鹤峰苏区中央分局决定放弃湘鄂边，转到川东南，开辟湘鄂川黔边苏区。

从1929年3月到1933年12月湘鄂边苏区反“围剿”大小战斗数百次，多数在鹤峰境内或边境地区进行，鹤峰因其在苏区的中心地位，成了苏区反“围剿”的主要战场，苏区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保存了革命力量，粉碎了敌军的多次大规模进攻，在相当长时期内，保证了湘鄂边武装割据局面的巩固和发展。

## 鹤峰苏区战略地位形成 的条件及其主要特点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时指出，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坚持奋斗下去，准备积蓄和扩大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他还指出，要想完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个伟大任务，就必须在游击区域建立巩固的红色政权。而其基本内容就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鹤峰苏区的开辟和形成是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它建立了巩固的红色政权，有一块巩固的地盘；它深入进行了土地革命；它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地方红军武装，在整个湘鄂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中，鹤峰苏区不仅是湘鄂边苏区的中心，而且是湘鄂西最富生命力的苏区之一。它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红色政权坚持时间长。从1929年1月13日建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至1933年12月红三军撤离湘鄂边时为止，红色政权存在整整五年，它是湘鄂西武装割据中建立最早的县苏维埃，也是最后丧失的县苏维埃。

（2）苏区各级政权体系完备，党群组织健全，鹤峰苏区当时除辖现在的县区以外，还包括巴东、建始、恩施、宣恩的部分地区，十一个区全部建立了区苏维埃，一百零三个乡建立了

九十七个乡苏维埃。1929年至1930年建立五个中共区委，六个中共区支部，二十五个乡有党的基层组织，仅1929年统计，全县即有党员五百多人，共青团发展亦很快，1931年上半年统计，“成立共青团县委，八区委，团员二百九十九人，县指导机关已能单独工作……青年参加革命异常踊跃，革命行动非常激进，的确说，是革命的主力军。”⑩现全区组织青年约二千以下，鹤峰少先队七百多，儿童九百多，均成立了县的指导机关，其他如妇女会、工会、商会等亦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3) 全民皆兵，战争动员量大。1935年，鹤峰只有六万多人口，但在1930年前后，直接加入各种革命群团组织的有二万五千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主力红军、工农革命军、红四军、红二军团、红三军都在鹤峰直接得到大量的兵员补充。地方武装编制完备，地方红军有红四军第五路军指挥部，湘鄂边教导师、湘鄂边独立团（又名鹤峰独立团），地方武装有县游击大队和五个游击支队，十一个区游击队，五十多个乡游击队（或称赤卫队）。在鹤峰东北、西北和南部设立了三个边防区，每边防区设边防司令部，下辖武装数百人；以邬阳关、金果坪为中心的巴建鹤边防司令部，以堰垭为中心的桑慈鹤边防司令部，以麻水椿木营为中心的恩宣鹤边防司令部。这样，鹤峰苏区总计地方武装六千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正如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所说：“日常的轮流堵卡，巩固后方，虽四面保卫团企图夺取鹤峰都不敢举动，所以红军虽间到前方，赖农民的力量，鹤峰的政权仍是保存着的。”⑪与此相适应的为全民皆兵、人自为战的武装斗争服务的后勤机关也发展起来，鹤峰境内先后建立了红军枪炮修

造局9所，后方医院11所，被服厂5所。

(4) 土地革命成效显著。1930年5月全县第二次党代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重点研究了土地分配的方针政策。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还贯彻了湘鄂西《土地革命法令》中的有关规定，如：不禁止雇佣耕种，不禁止买卖等。分配土地时对半自耕农也分给一部分，对自耕农采取团结办法，不动他们的土地，甚至给未逃跑的土豪及其家属也分给一分坏田。没有划分富农，只将相当于富农的所谓“殷实户”“余田户”出租的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样，中农的利益得到保护，土豪劣绅也并不断绝生活出路，政策比较稳妥。基本上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及后来“平分一切土地”的“国际路线”。农民在分配的土地上，有所收益，获得了两年以上的收成。1930年人平粮食产量达到六百多斤，比土地革命以前增长二成。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苏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巨大动力，由于生活有了保障，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红军，增强了苏区反“围剿”的力量。

(5) 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一是改造“神兵”，使之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二是改造和利用地方武装，在鹤峰周围建立以原地方实力武装为骨干的边防司令部，信赖他们同情革命的一面，改造他们的流寇思想残余，争取他们最终全心全意地参加到保卫苏区的斗争中来，并成为正规的红军武装。

鹤峰苏区在湘鄂西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不是偶然的。实践证明：“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

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sup>⑤</sup> 同时，它必须建立在我方在游击战争中取得相对优势，武装割据区域处于较长时期稳定的情况下，它必须完全具备红军和游击队存在发展的条件，必须造成伴随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可以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发展的良好环境。

从政治上看，鹤峰虽偏僻，但受革命影响较早，二十年代初即接连爆发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为主要目标的农民起义。1926年又受北伐和湘鄂农运影响，在鹤峰，一批共产党员下到山寨、乡村，到农民群众中，到“神兵”中，宣传马列主义。由于党的影响，农村阶级斗争已开始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分散到集中，由非武装到武装的演进过程。以活动在桑鹤边界的贺民英农民武装和邬阳关“神兵”为例，他们都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性质，他们常常自觉地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旦觉醒就接受党的领导，投入革命阵营。陈连振的“神兵”“一开始建立，就坚决地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年多的时间内，把湘鄂边境上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几个县的团防队（地主武装）几乎全部扫光了。”<sup>⑥</sup> 数万土家族、苗族贫苦农民除了深受阶级压迫以外，还受到民族压迫和歧视，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向往革命。

在经济上，土地、山林高度集中，人数占总人口百分之五的土豪劣绅却占有全县水田的百分之八十和旱地的百分之四十一。土豪劣绅剥削方式繁多，搜刮农民的办法层出不穷，农民农、副、土特产品价格极为低廉，远不足以应付各种苛捐杂税，无论荒年、丰年，贫苦农民都难以摆脱官府、土豪、奸商的盘剥，迫切要求改变现状。

从地理上看，鹤峰地处湘鄂边，地势高，为四水（溇水、澧水、酉水、渫水）之源，山势险要，山深林密，易守难攻，东出江汉、洞庭，西通川黔，北有清江为堑，南有武陵为屏，适于开展游击战争。且山中多峡谷、盆地，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精粗杂粮，足可养兵。

从敌方力量看，国民党政府在这里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力量同其它地区比较，相对薄弱，且内部矛盾多，指挥不统一，便于各个击破。

从社会关系看，贺龙同志的外婆家在鹤峰，从护国、护法战争起，鹤峰就有不少人追随他。他的旧部属、拜把兄弟和亲朋遍及鹤峰各地，社会联系广泛。贺龙的胞姐贺民英也在鹤峰长期居住，对鹤峰极为熟悉。

综上所述，天时、地利、人和，各种主客观因素，构成了鹤峰在二战时期成为湘鄂边苏区的中心并起到战略后方的作用，不是偶然的。

## 鹤峰苏区军民在武装割据 中英勇斗争的业绩永存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⑩</sup> 鹤峰苏区的历史也正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时期，由以贺龙、周逸群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带领湘鄂边人民经过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在1928年到1933年间，鹤峰苏区军民在创建苏

区和反“围剿”的战争中前仆后继，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数千人为革命献身，英雄烈士比比皆是。云来庄范松之、范辉强、范辉元、范辉久、范辉国五兄弟先后参加红四军，分别任营长、连长、战士、第五游击大队长、县游击大队长，他们对革命赤胆忠心，作战英勇，屡建功勋，被誉为“范家五虎”，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死时老大38岁，老五才18岁，城关徐氏三姐妹、姚氏三姐妹同时参加革命，其中有五人担任过县区苏维埃妇女主席、妇女委员、宣传委员；原鄂阳关“神兵”领袖陈宗瑜任红四军第四团团长，他在攻占鹤峰县城、桑植县城、红鱼溪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于章耳坪战斗中牺牲，其年过五十的父亲陈连振安葬儿子后，又毅然接受贺龙的任命，担任了红四军第五路军指挥，转战鹤峰苏区，直至牺牲。这样的弟兄、姐妹、父子、夫妻乃至全家同时参加革命的事例不胜枚举。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革命者的高尚气节，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中，湘鄂边独立团三营十二连在掩护独立团撤退的战斗中于鹤峰大围鼓锣山被敌包围，三十二名指战员宁死不屈，携枪跳崖，壮烈牺牲；1932年6月，湘鄂边后方军医院驻地屏山被敌军占领，敌军大肆烧杀，残杀我无辜群众和游击队员十余人，放火烧毁群众房屋七十八栋，整个屏山烈焰腾空，男女老幼无家可归，但这里的群众没有被吓倒，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帮助红军医院转移和照顾伤病员。十九岁的五里区苏妇女主席欧冬英被捕，伪区长企图哄骗她脱离革命队伍，对她说：“你年纪轻轻，搞什么革命！只要你说一声再不当共产党，我就担保不杀你！”欧回答说：“你这一回不杀我，我还是要当共产党！”敌人无伎可施，将她枪

杀了。十六岁的县儿童团总团长李庆成，被群众誉为“小贺龙”，在被捕后，敌军团长赵鹤亲自审问：“你只要说出谁是党员，谁是团员，就马上放你，不说就杀！”李回答：“党员也是我，团员也是我，再没有别人了！”顶得敌团长很狼狈。在赴刑场途中，李庆成沿路高呼：“苏维埃政府万岁！共产党万岁！”

湘鄂西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师长段德昌，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九师政委盛联均，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等许多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著名将领均在鹤峰牺牲。鹤峰前后三届县委书记、全部县区苏维埃干部除少数战斗阵亡者外，数百人被作为“改组派”杀害，幸存者极少。

红三军转移湘鄂川黔边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了疯狂报复和血腥镇压，又有大批苏维埃干部、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被杀。鹤峰被作为“红匪窝子”受到反复“清剿”。红三军部驻地麻水乡二百五十六户有二百二十三户受到严重摧残，全县上万人受迫害，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逃亡无下落者不计其数。鹤峰苏区军民为湘鄂西武装割据付出惨重的血的代价，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鹤峰苏区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又从恢复到丧失的过程，即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生、发展历史的缩影。尽管由于敌强我弱和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而终于丧失，但它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已成为我党我军历史经验宝库中的一部分。鹤峰苏区军民在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中，完成了土地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地位，为争取全国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光辉业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光荣革命传统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其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